

ГЕННАДИЙ ТРОШЕВ

作者系车臣
战争俄罗斯联军
集群司令员

我所亲历的战争

车臣战争

МОЯ ВОЙНА
Чеченский дневник
окопного генерала

〔俄〕根纳季·特罗舍夫 著
王尊贤 述弢 译

新华出版社



我所亲历的车臣战争

〔俄〕根纳季·特罗舍夫著

王尊贤 述弢 译

新 华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所亲历的车臣战争/ (俄) 特罗舍夫著; 王尊贤等译.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4. 1

ISBN 7—5011—6441—X

I. 我… II. 特①…②王… III. ①特罗舍夫—回忆录②反恐怖活动—史料—俄罗斯 IV. K835. 125.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107336 号

京权图字: 01—2003—5870 号

ГЕННАДИЙ ТРОШЕВ

МОЯ ВОЙНА

Чеченский дневник окопного генерала

МОСКВА ВАГРИУС 2001

ALL RIGHTS RESERVED

中文版专有权属于新华出版社

我所亲历的车臣战争

〔俄〕根纳季·特罗舍夫 著

王尊贤 述骏 译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 8 号 邮编 100040)

新华出版社网址: <http://www.xinhupub.com>

新华书店经销

新华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照排

新华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8.75 印张 210 千字

2004 年 1 月第一版 2004 年 1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ISBN 7—5011—6441—X/D·109 定价: 19.00 元

(若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 010—65895562 65897685)

作者的话

我的父亲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是个基干军官，空军飞行员。他在克拉斯诺达尔斯克航空学校毕业之后即派往前线。1945年5月，他在柏林迎来战争的结束。一年之后，他在格罗兹尼近郊的汉卡拉与来自捷列克的哥萨克纳佳——我的母亲相识。

1958年，父亲遭遇了所谓的赫鲁晓夫裁军，解甲归田。当年，许多大尉、少校——年轻、健康、精力异常旺盛的男子汉均遭此厄运。父亲因此耿耿于怀。甚至有一次，以他特有的直率，生硬地对我说：“你想参军，没门儿！”

我明白，他的心灵深处有着尚未愈合、折磨人的伤痕。这种事情不会不留下痕迹。他正当年富力强时即告别人世：那年才43岁。

我始终牢记父亲的嘱咐，中学毕业后，考入莫斯科土地规划工程学院建筑系。然而，父亲去世后，我只得中断学业，回到家乡，因为家境困难。我参加了工作，帮助母亲和姐妹。不过，到了履行自己对于祖国的神圣职责、穿上军装的时候，我递上报告，要求进入喀山高级坦克指挥学院学习，这违背了我父亲的禁令。我相信当时这样做并没有错，我毫不怀疑，父亲如果活在世上，他肯定会为儿子感到高兴。决不是因为小特罗舍夫当上了将军，成了军区司令员。父亲酷爱军队，这种感情也传给了我。事实上我是继承了他一生的主要事业，我为此感到自豪。

时至今日，我仍怀着感激之情回忆起自己最初的指挥员——班长索洛多夫尼科夫中尉，连长科尔泽维奇上尉，营长叶法诺夫少校，是他们教给我军事科学的入门知识。

时隔将近 30 年之后，在军校以及后来两所军事学院学到的知识，不仅在日常生活中、而且也在战争中得到应用。这是一场各个方面都很特殊的战争。一场由于主观和客观原因在本国领土上对付匪徒和国际恐怖分子的战争。一场在我的家乡进行的战争。一场就其特殊的规律而言，严格地说来并不符合任何经典的公式和规范的战争。

90 年代中期发生在北高加索的悲剧事件，在我国社会中有着不同的理解，而且至今引起争论。

我也许永远就不会提笔写自己的回忆录了。然而，直接或间接地讲述车臣事件的书已经出了不少。说来奇怪，大部分作者离他们“创作”中所涉及的课题实在太远。对于战争、人物（书中倒是提到了他们的名字）、当地居民的思维方式、军队，他们并未真正看见，也不了解。总之，由于某些作者如此轻率的态度，便制造出了有关北高加索武装冲突的一整套神话。

万事开头难。以文学界同行制造的这些神话为基础，关于车臣战争的童话便开始四处蔓延，一发而不可收。例如，在俄国社会中，所谓第一次车臣战争中军队平庸无能、软弱无力的论点几乎被奉为公理。如今，又一代“车臣专家”依靠这一似是而非的论点，在歪斜的基础上构筑着他们那同样似是而非的观点和结论。除了畸形的结构之外，还能有什么呢？

作为一个经历了两次车臣战争、参加过同达吉斯坦瓦哈比教派战斗的人，我无法容忍凭空臆测，更无法容忍关于我十分了解的那些事件的赤裸裸的谎言。

还有一个情况也促使我拿起笔来。车臣战争使得许多政治家、军事将领甚至匪徒在我国和国外声名鹊起。其中大部分人我过去和现在都直接认识。有的人我曾经见过、打过交道，我曾经同有的人一起并肩战斗过，还同有的人进行过生死搏斗。我知道他们的底细，知道每个演员言行背后的东西。然而，媒体给他们塑造的形象或者他们给自己塑造的形象，往往并不符合实际情况。姑且认为我的评价过分个人化吧。但即使这样，我依然认为可以公开表示自己对于许多“车臣战争风云人物”的态度。甚至有责任这样做，哪怕是为了保持画面的完

整性也好。

促使我讲述北高加索战争的，还有这样一种愿望：让大家都避免重犯 90 年代的严重错误，包括政治上和军事上的严重错误。我们应当吸取车臣的痛苦教训。而如果不对这个共和国近十年来所发生的全部事件进行清醒、沉着和深刻的分析，吸取教训就无从谈起。但愿我的回忆录在这方面有所裨益。

我曾经尽量坚持记日记，这些日记对于写作本书大有帮助。记忆是靠不住的东西，所以我有时将许多事情详细地记录下来，并对事件作出自己的评价。因此，读者可以发现不少日记的片段。

在此，不能不对那些帮助写作本书的人表示感谢。他们是：弗罗洛夫上校（北高加索军区司令部作战局军官），中校阿尔乔莫夫（《南俄军事通报》编辑部分析处处长），军区报的其他同仁。我还要特别感谢军事记者阿列欣上校和秋琼尼克上校，他们实际上成了本书的合著者。

在构思这本回忆录时，我想到那些在车臣失去亲友的人将是本书的读者，他们肯定想弄明白，他们的儿子、丈夫、兄弟是为了什么捐躯、又是怎样捐躯的……

命运使我在战争中与各种人打交道：其中有政治家，最高级别的将领，匪军的首领，普通的俄罗斯士兵。我曾在不同的情况下见到过他们。其中每个人的表现各不相同：有人坚决果断，有人消极冷漠，有人则在这场战争中玩了自己的“游戏”。

我认为最好是从那些我亲自遇见、我实际见到的人开始讲起（比方说，杜达耶夫我就不写）。不过人物中有不少战斗在“战线”的另一面。当然，我也表示了自己对于那些声名远扬的著名人物的态度。如同任何一部回忆录一样，作者的评价是有争论的，有时甚至很个性化。然而，这是我的评价，我想我有这个权利。

在复杂的、极端的情况下，就像在 X 光片上将人的整个实质充分显现出来，谁的价值如何，一目了然。战争中一切都暴露无遗：这里有懦弱，愚蠢，军人不光彩的行为，指挥员的错误。然而，这些都无法与俄罗斯士兵的英勇无畏、英雄主义、忘我精神和高尚品德相提

并论。我国军事史中所有最好的东西都应归功于他们。指挥员在地图上画出的箭头（进攻的打击方向）无论多么在行，多么漂亮，都得靠普通战士“用肩膀去拉”。应当向我们的俄罗斯士兵深深地鞠躬，因为他们挑起了军事考验的重担，而且没有垮掉，没有气馁。

那些曾经与我并肩走过艰难的高加索道路的人，本书中未能一一提到，殊觉遗憾。不过我怀着感激的心情始终牢牢记住我的那些（从士兵到将军）战友们，在新俄罗斯的困难时刻，他们为捍卫她的完整挺身而出。对于在战场上捐躯的战友，我深深地鞠躬：他们的英名永存！

目 录

作者的话.....	(1)
第一章 战争开始了.....	(1)
第二章 被偷去的胜利	(28)
第三章 奔袭时代	(46)
第四章 1996 年的胜利与悲剧	(65)
第五章 不战不和	(94)
第六章 入侵达吉斯坦.....	(125)
第七章 再次出征.....	(162)
第八章 捕狼陷阱.....	(202)
第九章 胜利不在山外,而在山中	(220)
第十章 高加索结.....	(251)
代跋.....	(269)

第一章 战争开始了

环境突然改变

1994年9月，我正在第聂伯河沿岸长期出差：我是调节冲突委员会的成员。此前不久，我任第一副军长的第一坦克近卫军自德国撤离，换防到斯摩棱斯克。

北高加索军区司令员米秋欣上将（我与他曾在西部军队集群中共过事）把电话打过来时，我正在位于宾杰雷的司令部。“根纳季·尼古拉耶维奇，你在后方呆得太久了吧？”米秋欣打趣地开始说道。“上我这儿来，到弗拉季卡夫卡兹当42军军长，如何？”我回答说：“您要是认为我适合这个角色，那我感谢您的信任。”嘴上这么说着，这突如其来的推荐弄得我的脑子里乱成了一锅粥。司令员仿佛感觉到了我的疑虑，又接着说：“对你来说，高加索可不是异国他乡，你是在这儿长大的嘛……我对你很了解，我认为你可以胜任。你不会呆得太久的：大有前途的职位很快就会腾出来……”我问道：“给我多长时间考虑？”“越快越好，”米秋欣回答道，他向我道了再见，就挂了电话。

我给妻子去电话。她说：“你自己拿主意吧。反正我永远和你在一起”。

当天晚上，我又给米秋欣去电话说：“我做好了准备”。而三天之后，我就在罗斯托夫向他报到了。

我们彼此都很了解。我们在数年的共事中建立了信任的关系，尽管并非任何时候都很融洽。

米秋欣放下了手头所有的工作，我们乘飞机前往弗拉季卡夫卡兹。他对我很亲切，花了几天时间带着我跑遍部队的驻地，把我介绍给军部军官以及第 19 摩托化步兵师、驻布伊纳克斯克的第 136 旅、驻普罗赫拉德诺耶的第 135 旅的人员。说老实话，这使我感到很吃惊。通常是在会议上、军事委员会介绍一下就行了。这次却如此关心。直到后来我才明白他为何像慈父般地关心我：他知道 42 军的部队不久即将开赴车臣。不过在我的面前自然只字不提，毫无暗示。

我当然知道围绕车臣的形势正在变得极其紧张。况且奥塞梯诺—印古什冲突的战火仍在微微燃烧。半年之后我的前任军长 A. 科列茨基在神秘的情况下牺牲在北奥塞梯的土地上，这就足以说明问题。我听说极端主义分子企图占领我们的武器弹药仓库，将我们的军官抓去当人质，其中也包括弗拉季卡夫卡兹卫戍区军事检察官。总之，那个地区的形势依旧复杂而紧张。

……此行即将结束时，米秋欣嘱咐道：“好好琢磨琢磨。有什么不明白的，打个电话来。”两月之后，根据总参谋部的指示，军区部队开始进行作战的准备和筹划。此次作战具有若干特点：

——第一，必要的措施均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

——第二，为了此次作战，成立了联合军队集群，其中包括在执行所赋予任务方面各具特点的各个部和部门的部队和设施（国防部、内务部队、边防部队、铁道兵的兵团和部队，联邦安全局、联邦政府联络与情报局、紧急情况部的部队和设施）；

——第三，因为战斗任务将在俄罗斯联邦的一个主体境内进行，预计军队的行动会受到很大的限制；

——第四，需要对情况进行深入的、多层次的分析，因为关于车臣的内部形势以及杜达耶夫分子和反对派的兵力部署情况的材料相互抵触，出入甚大。

根据国防部的指示，按照总统令提出如下任务：“……在前线空军和军团空军的掩护下，通过集群行动分三个方向向格罗兹尼推进，

封锁该市并为非法武装的自愿缴械创造条件。若拒绝缴械，则进行攻克该市的战役，然后稳定该共和国全境的局势。”

我常常想起军队采取整顿宪法秩序的最初步骤的那些日子。新闻记者立即将局部战役称之为战争，人权卫士将其称之为对车臣民族的种族灭绝，政治家则称之为冒险行为。我对于那些事件有自己的看法，我在本书中是尽量原原本本地讲述我的所见所闻和亲身经历。

任何战争都是由政治家来开始和结束的。可以将 1994 年 12 月作出的关于出兵的政治决定当成冒险行为吗？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的。自从 1991 年杜达耶夫上台执政后，共和国内就一片混乱，无法无天。在俄罗斯部队撤出车臣（1992 年）、留下大量军事装备和弹药库之后，已很清楚：新的车臣执政者早晚会利用这个军火库的。果不其然，杜达耶夫将军当即开始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暗地里准备打仗。而莫斯科的政治家们则装出一副仿佛任何特殊的事情都未发生的样子。

至第一次车臣战役开始时，杜达耶夫已拥有相当的战斗实力：两个旅，7 个独立团，三个独立营。人员：约 5000 — 6000 人，而在 5 — 6 天内补充齐全后可达 15000 — 20000 人。技术性战斗装备也很可观：坦克 42 辆；步兵战车、装甲运输车 66 辆；火炮和火箭炮 123 台；防空装置 40 件；轻武器将近 42000 件。此外，居民点中还成立了总人数达 3 万的“自卫队”。俨然一支装备齐整、全副武装的军队。

我曾在《劳动报》上看到原国防部长格拉乔夫独特的自白。文中也讲到那次难忘的安全委员会会议（1994 年 12 月底召开），会上实际上作出了关于武力解决“车臣问题”的决定。这里不揣冒昧地引用该文的片断：

“民族事务部长尼古拉·德米特里罗维奇·叶戈罗夫作了关于当前形势的报告。他说，车臣一切都很正常：‘由于在居民中间开展工作’，我们取得了进步：70% 的车臣人期待着俄罗斯军队的到来。其余的 30% 基本上保持中立。只有被社会抛弃的人将负隅顽抗。当时在高加索，叶戈罗夫被称为‘叶尔莫洛夫第二’。在那次安全委员会

会议上，他说的那句所谓车臣人‘将会用面粉铺满我们士兵的道路’的话简直将我激怒了。”

后来，格拉乔夫仿佛自我辩解地说过，他曾试图让安全委员会的成员相信不宜出兵，尤其是在 12 月份。如果一定要出兵，那也得到春天。在此之前从经济上施加压力。然而此类方案被一致否决。向各司令部发布了准备和进行战役的指示。

为了执行既定的任务，成立了几个方向的军队集群。弗拉季卡夫卡兹方向为由我这个军的部队组成的混成队。由我的副手 B. 比特鲁克少将领导。推进方向：切尔明、新沙罗伊、阿尔汉—尤尔特。任务如下：“在靠近推进路线的抵抗地段，以炮兵火力和空中打击打败武装组织，并继续向该地区推进”。我明白，军人的语言往往不合乎语言规范。然而其他职业人士也有自己的语言。并不是全都可以简化的。

12 月 11 日拂晓，混成队开始行动，然而到中午即得到令人惊慌不安的报告：在纳兹兰市入口处的桥上，车队受到印古什武装警察领导的当地居民的阻拦，他们烧毁了我们的 10 辆小汽车，推翻了 6 辆。17 时 15 分，参谋长报告说，在加济—尤尔塔区，有人从森林那边用自动武器向车队开火。出现了第一批伤亡：列兵维塔利·马斯连尼科夫阵亡。

我记住了他的名字。这是我的第一个甚至不是在战斗中、而是因挨冷枪牺牲的部下。当我听到伤亡报告时，都想到了什么呢？不必口是心非，我不记得了。不过有一种惊慌不安、乱七八糟、似是而非的感觉。其实，我军许多军官当时都是这样的感受。其他运动方向的情况也是如此：那些男人从老人、妇女和儿童组成的人肉盾牌后面跳将出来，用磨得锋利的金属倒刺钉将轮胎戳破，用特制的钩子扯断油管和刹车管。车队行进路线上的许多地方都埋上了地雷。总之，当时印古什变成了抵抗活动的策源地。仅凭这个征兆即可明白，我们唱着进行曲是无法进入车臣的。

司令部的糊涂事

这已不是什么秘密：许多肩章上缀有大星星的指挥员和联盟级将领以为，只需朝格罗兹尼推进，往空中放上两枪，就大功告成了。充当匆匆批准的作战计划的基础的，正是吓唬的方式。后来得知，在最高一级批准时，谁也没有提出意见。因为谁也没有好好地研究过那个计划。结果只得进行重大的修正，并且在行进中改变队形。

这里仅举一例。作战计划的全部重担都落在以北高加索军队集群为基础成立的联合军队集群身上。而临时派去的总参谋部代表（达数百人之多！）充当顾问的角色，却不对自己的“咨询意见”负任何责任。更有甚者，他们在折腾军区军官、妨碍有步骤有计划工作的同时，却不履行自己的“职能”：实际上未向司令部提供关于可能的敌人、其战备状态、战斗行动可能的性质、非法武装指挥员的“行踪”等方面必需的准确材料。事实上，作战计划是盲目制定的。

可能有人会反驳说：关于匪徒的情报获取应当由专门机关——情报总局、联邦安全局（当时的联邦侦察局）……来负责。他们才是罪魁祸首。

这个论据有一定的道理，但不知跑来干什么的一大帮莫斯科将军和上校马虎糊涂的责任也无法推卸。高谈阔论，忙忙碌碌，“盛气凌人恐惧症”的气氛，凡此种种，显然无助于正常的司令部工作。总之，万事开头难。

出于最大限度地保障人员安全和保护和平居民的生命良好愿望，司令部作出决定：在战役的第一阶段，向前推进和战斗行动通常都在下午三点至四点之前（天黑之前）进行，此后各部队和分队即应占领集中区域，保持战斗保障的一切措施。考虑到匪徒将会特别瞄准指挥所，计划每隔 5—6 小时更换指挥所的位置。然而这样的策略并未收到预想的效果，我军推进速度的减慢反倒使敌人可以在重要战线上多加把劲，并袭击我方部队和分队的驻地。

当时军队的行动千篇一律：白天 2—3 小时从事积极的战斗，而且仅仅是在空军的支援之下，一昼夜内的其余时间则处于完全消极的状态。将主动权让给杜达耶夫分子的危险确实存在，他们经常搞得我们的部队十分紧张。他们很快就适应了这种千篇一律的方式，事先就将补充兵力调集至我们的车队驻扎处前面的据点。

10 天之后，对联合军队集群行动所作的仔细分析揭示出重大的疏漏和缺点。

第一，很清楚，军队并未做好在类似情况下行动、执行并非其固有的职能的准备。要根据专门的计划进行准备。

第二，反映出混成队中的所有分队都是拼凑起来的（占到 80%），他们并未经过完整的训练和战斗磨合过程。什么是战斗磨合呢？这就是说坦克或者步兵战车的机组人员应当是一个统一的坚强家庭，大家相互默契。例如，同样的一个机师兼司机，他应当很快弄清楚战车开往何方、何处停车、何处加油、如何帮助瞄准手瞄准射击。当认识不过几天时间的两夫妇陷入最复杂的日常生活困境时，家庭会出什么事呢？！至少争吵和歇斯底里发作是不可避免的，甚至会完全失和。至于战车机组人员，那下场就更可怕了：死亡。

第三，军官，尤其是从中尉到大尉的初级军官，不具备在非标准情况下进行指挥的素养，面对复杂的情况时心理上打退堂鼓。例如，他们将聚集在道路上的人群当成整个当地居民反对“侵略者”斗争的征兆。尽管杜达耶夫分子往往以武力相威胁，将和平居民驱赶到我军的推进路线上来。

第四，指挥不同类别和不同部门的兵力和设备（国防部、内务部，联邦边防局……）乃是薄弱环节之一。

第五，也反映出了我国传统的不幸，例如因枢纽和部件经常损坏，未能充分发挥战斗技术装备的潜力。毋庸讳言，我们的设备陈旧，都是 20—25 年前甚至更早的产品（例如 T—62 坦克，БМП—1 步兵战车，БТР—70 装甲运输车……）。

至于军事侦察，那只是偶尔进行。而且侦察分队往往并未用于其直接使命（比方说用于指挥所的保卫）。总之，由此得出完全确定的

结论：必须作出重大的决定。这样的决定作出了。

考虑到当时的情况，国防部长格拉乔夫于1994年12月20日发布命令，任命总参谋部作战总局第一副局长阿·克瓦什宁中将为驻车臣共和国联合军队集群司令员。我们当即感觉到了情况正在好转。克瓦什宁对集群司令部的工作进行改组，把一部分将军当成包袱甩掉了，并实行了某些战术上的革新。为了使自己的军队活跃起来，使敌方战地指挥官摸不清真实的意图，司令员提出了“机动灵活地作战”的任务。这个表述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在东部战线，空降团混成队行军160公里，从两翼迂回至格罗兹尼后面，推进至阿尔贡以西的地区，并于夜间与驻守在防备完好的据点内的匪徒交火。在霍哈列夫上尉指挥下，该连以其懂行和坚决的行动钳制住敌人的主动权，使团的主力全部投入战斗。空降兵击败匪徒，天黑之前占领了战略要地。

这完全出乎杜达耶夫分子的意料。在失去这个地区后，非法武装司令部从格罗兹尼和阿尔贡调集了大量预备队伍，其中包括充实了坦克、装甲运输车、火炮和火箭炮的匪徒分队。然而此时该团已经做好了迎击匪徒的准备。协调一致的火力系统，在危险方向的地段布好地雷，我方空军和炮兵对敌方车队和作战秩序的打击，这些都迫使敌人节节败退。

这仅仅是用以说明整个战役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的一个插曲。通过巨大的努力，至12月底局势得到扭转，甚至还夺回了主动权。匪徒所组织的对于格罗兹尼和纳兹南方向的居民点的防卫，迫使联盟军队多少改变一下战术：不通过战斗去强行占领居民点，而是绕过去。经过艰苦的战斗，占领了制高点，可靠地切断了北边、西边和东边与车臣共和国首府格罗兹尼之间的交通。军队未等到空军的支援（由于复杂的气候条件空军无法行动），进入指定地区，几乎完全包围了格罗兹尼。格罗兹尼只有南边可以通过。这一成果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新领导人。国防部长任命克瓦什宁为联合军队集群司令员，可谓“正中靶心”。后来，格拉乔夫对自己的决定作了这样的解释（引自发表在报上的文章）：

“从一开始就公开反对出兵的只有鲍里斯·格罗莫夫一人，但他也并未过早地提出辞呈，持观望态度。

早在出兵之前，我就任命了北高加索军区司令员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米丘欣上将。我亲自出面保护他。可是斯列普佐夫斯卡娅镇附近一开火，米丘欣就惊慌失措了。开始对部下大声呵斥，乱了方寸。我曾试图安慰他，却并不奏效。后来我给他去电话说：看来你是‘有病’了，你就坐上直升机回罗斯托夫吧。

我开始亲自指挥。可是我总不能把一切都丢开，一门心思忙车臣的事情吧。我把陆军第一副司令员沃罗比约夫请来。他在莫兹多克负责部队的战前训练工作。他在司令部会议上作起报告来总是头头是道：部长同志，某某部队已准备好投入进攻，某某部队仍在准备之中……他至今在国家杜马同样希望以威武将军的身份出现：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我向他说明情况：爱德华·阿尔卡季耶维奇，米丘欣有病了，上帝本人命令您来领导这次战役。这时我亲爱的沃罗比约夫将军满脸通红，沉默了15—20秒钟，突然声称：拒绝指挥。怎么能这样呢？我命令您！可他说：军队没有做好准备。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早不说？这是您的报告，您负责准备工作。就是说，您一直在骗我？您知道这会有什么后果吗？15年徒刑，或者是枪毙……他回答说，随您的便，您就这么定罪吧，反正我不指挥。总之，我把他打发回莫斯科，威胁说要起诉他。他扬长而去。

我回到莫斯科后，将全部情况对叶利钦作了汇报，甚至提到沃罗比约夫应予治罪。叶利钦让我挑选指挥战役的人。康德拉季耶夫将军当下对我说，1993年10月的事情已经搞得他够呛，他顶不下来——身体有病，在阿富汗就把心脏搞出毛病了。格罗莫夫拒绝出山，理由是他始终对出兵车臣持反对态度，而且当即表示准备提出辞呈。我再无其他的副手了……和平时期个个都挺好，又聪明又勇敢，到战斗一打响，全都溜号了。将军也是如此。”

时隔数年之后格拉乔夫讲到的这些事情，当时集群部队里已进行过热烈的讨论，诚然大家都是左顾右盼，提心吊胆。因为高级指挥员肯定有自己的见解，包括在撤换米丘欣将军和任命克瓦什宁将军的问

题上。然而传闻归传闻，事实归事实。

我本不想就失误和错误对某些政治家、高级将领妄加指责和批评，不过有些评价和看法却在所难免。因为作为一个军人，我对于某些军事将领以任何借口拒绝执行命令的现象就无法容忍。承认这点是很痛苦的，然而决非人人都在那场战争中表现出了高级的职业技能、指挥员的品质，并非所有的将军都能够（或者是愿意）挑起责任的重担，而且不得不为所有这一切付出沉重的代价。

帕维尔·格拉乔夫

人物素描

我认为，仅凭任命克瓦什宁为军队集群司令员这一大胆的决定，国防部长格拉乔夫就值得感谢。因为这决不仅仅是大笔一挥在命令上签字的问题。这样的人事配置是困难的一步，从中可以看出对于局面和对于能够控制局面的人的了解。不要忘记，在战役开始的九天（！）之后就作出了新的人事任命。要是再拖下去，我们战士抛洒的鲜血就会多得多。

我同格拉乔夫见过几次。有时在莫兹多克，有时在车臣境内。1994年12月和1995年5月，我曾两次向他报告我对某次战役的想法。我记得他在格罗兹尼的北方机场仔细听取我的汇报，提出几个问题，批准了我这个南线军队集群司令员的计划。他要求我对人员加意爱护，不得出现无谓的伤亡。

我很佩服他的平易近人和与下属坦诚相见。他与原苏联国防部长亚佐夫元帅不同，亚佐夫尽管在军中备受尊重（他的经验和战功均无可争议），却对人严厉，难以接近。这使军官们望而生畏。身为国防部长，何必要把下属搞得一个个呆若木鸡呢？军队中，本来等级服从制度已赋予职务和肩章以同个人品质无关的威望。还有必要靠个人的威严甚至粗暴来进一步增强权力的外部特征的效果吗？

毋庸讳言，我喜欢格拉乔夫。年轻，果断，大胆，在阿富汗打过仗……我甚至原谅了他无意中的欺骗，或者用时下的术语来说，是